

祁太秧歌中女性生活史的民俗学分析

钱永平¹, 钱永琴²

(1. 绵阳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 四川绵阳 621000;
2. 交口县中学, 山西 交口 032400)

摘要: 祁太秧歌是山西晋中一带民众喜闻乐见的地方小戏, 其中许多关于描述婚姻家庭冲突的剧目, 结合乡土社会民众生活史, 可以发现其内容蕴含着底层社会女性对于男权的勇敢反抗以及对幸福婚姻的追求, 传达着女性尊严的话语权及对个体生命价值的人本主义关照。

关键词: 祁太秧歌; 家庭冲突; 女性观

中图分类号: J8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08(2008)01—0100—05

祁太秧歌在山西晋中一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从清末至今, 一直是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地方小戏。秧歌唱的是“家庭戏”“女性戏”, 与晋剧唱的“朝代戏”相对。当地人逢年过节, 婚丧嫁娶, 贺生祝寿, 只要经济条件允许, 都会请一台祁太秧歌, 足见其受欢迎程度。祁太秧歌中的很多内容反映的是清中期到民国初年乡村民众的人生际遇, 本文依据2004—2006年在晋中一带田野考察获得的至今仍在城乡被艺人表演的祁太秧歌剧本, 着重分析小戏中表演的婚姻家庭生活, 阐述其中蕴含的底层社会女性价值观。

一、包办婚姻引起的夫妻冲突

1. 代表剧目:《古董借妻》《五秃儿闹洞房》

2. 其他剧目:《洗衣计》《杀子报》《扯被阁》《寺中缘》《挑帘》《卖柴记》等

3. 情节模式:

① 男主人公(李天龙)丧妻, 其妻留下的嫁妆为其岳母保管, 并约定若男主人公再娶并认亲, 愿将嫁妆还给男主人公。

② 男主人公进京赶考缺少盘缠, 欲“借妻”从岳母那里骗取嫁妆做为盘缠。

③ 男主人公有一结拜兄弟张古董, 生性爱财, 男主人公许诺得到嫁妆后分一些给古董, 古董答应

借妻子女主人公(沈月英)一天。

④ 女主人公借此机会提出与男主人公共同生活。

⑤ 古董不同意, 告官, 县官判男女主人公结合。

这一类秧歌中女主人公对自己的婚姻生活发出了不满的呐喊。婚前她们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 有的女方父母把女儿嫁人是为偿还债务。“心儿里埋怨二老爹娘, 把奴家顶账嫁可怜”(《洗衣计》)。而婚后, 丈夫又很不尽如人意, 他们或者在相貌体形上有缺陷, 或者是双方年龄差距较大。她们由此对家长心生怨恨, “心儿里埋怨二老爹娘, 为使唤银钱害了奴家”(《五秃儿闹洞房》), 在《古董借妻》中, 女主人公沈月英坦言道:“奴家房中泪淋淋, 找的男人不随心。有心与他活拆散, 又怕外人笑俺们……”当古董要把她“借”出时, 她起初并不愿意, “借米借面世上有, 谁家的妻儿借与旁人。”说明她是恪守所谓的“妇道”的, 但是见了年轻英俊的李天龙后, 在伦理与感情的天平上, 她马上偏向了感情一边。可以说, 是她丈夫办的糊涂事给了她自主选择婚姻的机会, 她大胆地把握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贤弟搀我下驴身, 故意儿跌在他身上……”初次的进攻放肆热烈, 男主人公反倒躲躲闪闪, 沈月英则无所顾忌地讲出了“他亲口让我做

[收稿日期] 2007—09—17

[作者简介] 钱永平(1977—), 女, 山西祁县人, 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民俗学;

钱永琴(1972—), 女, 山西祁县人, 交口县中学, 硕士, 研究方向: 三晋历史学。

你妻,快与嫂嫂来成亲”,大胆促成了二人的结合。而糊涂县官的判决,使张古董成了丢脸丢妻的倒霉蛋,女主人公大获全胜。

此类剧目在舞台上的表演极富幽默,一个“借”字成全了一位底层妇女追求幸福的愿望,说明现实状况与民众潜意识中的理想婚姻有差距。中国传统社会的包办婚姻有两重意义,一是婚姻的缔结由父母操办;二是婚约一旦确定,就不能随意解除。乾隆时的《祁县志》记载:男女门户相当者,通以媒妁,凭以婚启,一言既定,金石不渝。由此引发的家庭悲剧不在少数,由于以夫权为主的社会对女性的制约远大于男性,在不和谐的婚姻生活中,女性只能是沉默的羔羊。

秧歌成了女性话语的传声筒,有学者称之为“带有权力和反抗含义的表演”^[1],祁太秧歌《挑帘》中表现出对打上“淫妇”标签的潘金莲人性层次上的同情,“世上风流男子有千万,偏偏将我许配武大郎,每日里埋头做烧饼,人人叫他三尺汉,每日里无人搂抱,奴家贫苦谁知道……”听了这段唱词,恐怕没有人再会指责她的离经叛道了。小戏着力渲染潘金莲如何通过挑帘结识了西门庆,那根掉在西门庆头上的挑帘棍,它不是可有可无的道具,如同绣球,其正面意义就是女性自主选择爱人的表现。从这些小戏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对婚姻的看法:男女双方的结合应建立在互相欣赏的基础上,年轻、健康、充满活力,让她们心神荡漾,这样的男性才是他们的理想丈夫,也说明在当地民众的心中,和谐的性爱是家庭美满不可缺少的条件,但现实生活却恰恰相反。

在包办婚姻中,女方父母得到了经济实惠,女儿却生活在不称心的婚姻中,反映包办婚姻的小戏都将婚后生活的不美满与妻子对丈夫相貌的(丈夫形象均由丑生表演)不满意对应起来,这正是与包办婚姻相对照的产物,那些偶然闯进她们视野中的男性却那么英俊,强调包办婚姻中的丈夫的容貌丑是她们在勇敢遵从了内心爱情的召唤时为自己的情感选择找到的恰当理由。

《古董借妻》中的女主人公由于丈夫的偶然决定而成功获得了自己理想的婚姻,祁太秧歌中这样的女性还比较多,于是也制造了大量的“婚外情”,《洗衣计》中白秀英故意把水泼在她喜欢的人身上,假装为其洗衣,从而创造机会向意中人表白心愿。为寻一个好“后生”,她们中有的甚至铤而走险,谋

杀亲夫、证人。如《挑帘》《卖柴记》中的女主人公。

有学者研究了清乾隆、嘉庆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档案中记载的人命个案指出:“从总体上看,包办婚姻是与婚前婚姻契约的严格遵守与婚后夫妻关系的低水平维持、刚性的离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对婚姻有所不满的男女,尤其是女性,找不到婚姻调整的机会,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从而加剧婚姻冲突的程度。”^[2]

二、丧偶妇女再婚

1. 代表剧目:《菜园会》《寺中缘》

2. 其他剧目:《上坟》《苦伶仃》等

3. 情节模式:

A、① 女主人公丧夫,在婆家日子艰难;

② 婆婆为得财礼给她另选丈夫;

③ 女主人公知息后与情人私奔。

B、① 女主人公的婆家让她再嫁;

② 女主人公在寺庙中躲雨时遇上和尚、秀才、农夫,决定在三人中选丈夫;

③ 女主人公考验三人,选中农夫。

丧偶妇女也称寡妇,丈夫去世之后,她们就失去了经济依赖,经济状况随之恶化。宋代以来官方伦理及民间风俗是鼓励妇女从一而终的,但结合田野考察资料,底层社会中的寡妇所处家庭、社会环境均不利于她们守节。因为在底层社会中丧偶妇女的守节行为会增加家庭中男性的经济负担,减少家产,而如果丧偶妇女再嫁的话,原婆家还能获得额外的财礼。在物质利益面前,婆家通常会选择让丧偶妇女再婚,《菜园会》中女主人公的婆婆为得三斤谷子两吊铜钱儿就把她卖了,小戏中表现了女主人公面对第二次的买卖婚姻,决心与情人私奔:“讨吃要饭也不回头”。《寺中缘》中的寡妇自主选夫,她从实际生活利益出发,选中了农夫。“我爱你人好手儿勤,咱今日把亲订,奴不用三媒和六证”。这个小戏开头就交待了下着大雨,与当地俗语“天要下雨,寡妇要嫁,谁也拦不住”相暗合。由此可见,寡妇守节在下层民众的实践中,并不是如官方宣扬的那样。

综上所述,在乡土社会底层女性始终怀有追求幸福婚姻的梦想。祁太秧歌被当地民众称为“家庭戏”,而女性是家庭中的重要角色,祁太秧歌中女主人公对原婚姻的背叛,传达了代表自己性别尊严的话语权,“民众从来都是意义的制造者,民众的现场演出,既是他们的生活,又不是他们的生活,他们

具有在现实生活中骚动的欲望和感受,但出于对权力支配的策略,他们运用口头语言,采取了使生活戏剧化的方法,来迂回表达他们的观点。”^[1]

三、婚姻关系稳定的家庭冲突

在“婚姻关系稳定的家庭中,秧歌戏侧重表现家长与主妇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3]家长主要指丈夫和婆婆,主妇即妻子,祁太秧歌主要描述了以下三类夫妻冲突:

(一)商人家庭中的夫妻冲突

1. 代表剧目:《算账》《张公子回家》

2. 情节模式:

①女主人公妻子(刘英芳)在家贫寒度日,丈夫在外经商;

②丈夫回家后,看到家中贫寒,开始怀疑妻子将其所捎银钱挪作他用,责问妻子是如何花钱的;

③妻子将所用开支详细告诉丈夫,收支核算无误,并还有存银;

④丈夫张三在妻子艰苦度日、勤俭持家的事实面前,知道误会了妻子,认错以求妻子原谅。

《算账》可谓是祁太秧歌经典中的经典,笔者田野考察中采访的秧歌老艺人苗根深就是以唱《算账》而走红的^①。年轻时他所在的戏班在文水一个村子演出六场,当地民众五场都点了他的《算账》,场场爆满,如不演《算账》,台下老少就起哄要砸场子,由此可见这个剧目的受欢迎程度。《算账》中的女主人公刘英芳向自己的父母借来衣物首饰,当了后凑足丈夫外出经商的钱,自己一人与孩子在家度日,然而丈夫经商成功归来后,却因妻子烧火慢,打不来一盏热茶训斥妻子:“我张三在这里气昂昂,……骂声妻儿刘英芳。……那一年我捎回来白银三两,为什么你不把煤炭来拉,又捎回两吊钱叫你零花,你把这些银子钱儿干了什么?桌子上我就把算盘盘来拿,你那里说我这里打,宗宗件件你都说到,我今天回来和你算账。”戏演到这里,张三趾高气扬地拿起了算盘,妻子则用手指着算盘颤抖,以“苦调”向丈夫详细陈述家庭开支,这是整个小戏的核心,夹杂着一个家庭妇女独自操持度日的苦楚。

算完账后表演达到了高潮,令丈夫意外的是,妻子算得毫厘不差,他意识到不该“为难”妻子,小戏的气氛瞬间发生了转变,妻子有理有据地指责丈夫“一盅茶打得慢了,生气的架子你放下,要和为妻把账算,算得对了高兴煞,算得不对了轻是骂,重是打,再不了把为妻休出家”,她将自己的艰辛生活与

丈夫吃穿不愁的生活做了对比,最后主动提出离婚“我在家等你八年整,早该反穿罗裙另改嫁,从今我把心眼裂,不和你这没良心人活,把你的娃娃都留下,从今天咱就拆散了人家。”通过妻子的哭诉,传达出当地农民心中标准的女性形象,一个美满的家庭是离不开那些富有牺牲精神的女性的,她们牺牲的不仅仅是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还有为支持丈夫经商以脱贫而独自持家所付出的体力与精力。观众对把持家庭经济权的丈夫和妻子算账这种“为富不仁”的举止表示了强烈的谴责,而对刘英芳每一分钱都花得合情合理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通过当地民众的口述表明,在现实生活中,勤俭持家、精打细算,是当地民众一致认同的生存策略,延续至今。算盘就是精打细算的象征,丈夫持算盘是其拥有家庭经济支配权的表现,当刘英芳口述日常开支数目与丈夫在算盘上拨出的数目完全相等时,丈夫于情于理都处于下风,事实上,丈夫的成功正是作为妻子付出情感和青春后所获得的巨大满足。而“算帐”让妻子万分委屈,站在理字上对丈夫不依不饶,最后“千言万语她还是不让,立逼的本丈夫与你跪下”,情节发展到这一步,隐喻着女性在争取家庭生活地位的平等上获得了成功,能够与丈夫平等对话,成为这个小戏中最叫座的部分,让台下人看了非常痛快,正是这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使《算账》常演不衰。

“当地艺人和观众长期生活在同一个民族的环境中,因此每唱的一个折子戏,要表达什么功能,双方都能心领神会,这是一个民众集团内部所能创造的现场文化意义,他们其中的任何一方不在现场,其内部意义也就不存在。”^[3]

(二)农民家庭中的夫妻冲突

1. 代表剧目:《锄田》《割田》

2. 情节模式:

①男主人公(丈夫)清早到田间劳动,嘱咐女主人公(妻子)送饭到田间;

②妻子送饭迟,丈夫发脾气,夫妻二人开始争吵,互揭相亲时对方的笑话;

③丈夫打破饭罐,妻子埋怨他浪费钱财,并说明挣钱的不易;

④丈夫认错,夫妻二人和好。

许多研究一致表明,中国封建社会丈夫和父亲凭着社会规范及对家庭经济资源的控制,可以操纵以及决定妻子和孩子的命运,女性无权提出异议,

但这类小戏说明下层社会实践并不是这样的。小戏中的丈夫指责妻子时，妻子会毫不留情地谩骂丈夫，结合田野考察中对民众生活史的了解，我们有理由认为，现实中丈夫权威地位的确立有赖于他们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养家糊口，不具备这个能力，就是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家庭内部发生妻子对于丈夫地位的挑战就不可避免。极端的例子便是由于贫穷、物质利诱，可以让夫妻中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性越轨保持沉默，如《奶娃娃》，女主人公的丈夫抽鸦片使家庭一贫如洗，女主人公靠给财主家的孩子喂自己的乳汁为生，后与财主发生性关系被丈夫发现，这时通奸男性拿出钱财请求宽恕，丈夫就此做出让步，默许妻子的行为，借以获得经济补偿。

（三）婆媳冲突

在中国扩展家庭中，夫妻关系常受到婆媳矛盾的影响，已是个老话题。前人对这类祁太秧歌剧目已有分析^{[1][2]}，阐述了为媳者在男权文化秩序中的艰难处境，当从媳妇熬成婆后，便将曾经遭受的痛苦报复在下一代非血亲的媳妇身上，根本原因在于这是男性中心意识内化为女性文化心理的恶果。

1. 代表剧目：《小姑不贤》（又名《女阎王巧斗母老虎》）《小姑贤》（又名《登云休妻》）

2. 其他剧目：《扳骨饼》《安安送米》《蒸糕》

3. 情节模式：

① 婆婆（母老虎）和女儿（小姑子）串通虐待进门的媳妇（嫂嫂）；

② 媳妇的姑姑（女阎王）得知侄女在婆家遭受虐待的事后非常愤怒，母老虎的女儿被许配给女阎王的儿子，媳妇的姑姑决定以牙还牙；

③ 母老虎的女儿与女阎王的儿子成亲后，过着与自己嫂嫂一样的受虐待的日子，开始悔悟自己出嫁前的所作所为；

④ 小姑子回到娘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劝母亲停止虐待嫂嫂，并向嫂嫂认错；

⑤ 母老虎在女儿的劝说下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婆媳和好，两家人和睦相处。

这类秧歌中，演的是婆媳矛盾，但可好可坏的小姑子却成为小戏大团圆结局的关键人物。在传统的人伦秩序中，人们遵循“百善孝为先”，如果媳妇不孝敬老人，乡民们就会嘲笑媳妇的父母没有家教。反过来，婆婆“教育”媳妇被认为理所当然。

纵观传统社会中的家庭秩序，男家长地位最高，其次就是他的妻子，媳妇作为家中唯一与她没

有血缘关系的小辈成员，便成为她泄怨愤的对象。《小姑不贤》中小姑与婆婆结成血亲联盟压制媳妇，飞扬跋扈，与其出嫁后受她婆婆的虐待形成了极大反差，这种隐含报应式的表演马上使看戏的乡民心领神会。《小姑贤》中的小姑子却是富有远见的，她懂得，今天她是母亲的掌上明珠，明天就是婆婆眼皮下的媳妇，她看到母亲虐待嫂嫂，马上预想到自己明天的处境，看到母亲虐待嫂子时，她现身说法：“妈呀，同是一碗面，我嫂子给端上，你嫌它没咸没淡缺盐又少酱，我手也没动脚也没进厨房，我端来，你就说没进门就闻着香呀。嫂子扫的地，你就说，秃老婆画眉，横一下来竖一下，你听说是我扫，你就说，干干净净溜溜光。这鞋听说是我嫂子纳，你就说，不象底不象帮，好象是给驴钉的掌，一听说是我纳，就成了横也是行竖也是行，这三件事都是我嫂子做，没见夸来没见你讲……我说你偏心一点也不冤枉，待姑娘待媳妇，你是两样的心肠……”看到哥哥在母亲的逼迫下写休书时，便教哥哥如何应付母亲，保护妻子，最后，她以极端的方式——跳井，唤起母亲的爱心：“我想这女儿家，假若嫁了人，遇着像你这样的，今日打，明日骂，遇着个丈夫像哥哥，婆婆让休就休，那叫我可怎么好哇，我要跳井！”把自己想象成出嫁后的媳妇，带动母亲把对女儿的温情向嫂嫂延伸，最终使家庭充满祥和的气氛。

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婆媳发生矛盾时，有的丈夫尽管心疼妻子，却不敢说半句维护妻子的话，更不敢流露出责怪母亲的意思，否则，他就要背上不孝的名声，一位西方人考察了中国家庭的婆媳关系后指出，不孝子是令每一个中国男人闻之丧胆的罪名。^[3] 小戏公开批判了男权权威的代表——婆婆，民俗学者董晓萍在考察定县秧歌中的这类小戏后认为其观念核心是主妇权，否定家长权威滥用权力，应该在尊长敬老的同时，给年轻一代以民主和自由。^[4]

上述三类反映传统社会中已婚家庭冲突的祁太秧歌小戏，以颠覆男权的方式实现了女性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胜利，完成了对女性尊严的补偿，蕴涵着对人的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及人本主义关照。

四、余论

在调查中发现，文中提到的剧目在当地乡土社会点击率很高，是压台戏。这种民间剧场效应，是由“民众的生活史决定的”^[5]。

在现代社会,祁太秧歌在乡土社会中呈现出逐渐萎缩的发展状态,许多年轻人几乎不看秧歌了,看秧歌的群体主要是一些中老年人。许多秧歌艺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祁太秧歌再也不能特立独行于当地社会了,如何能使祁太秧歌继续活跃在农村的民众文化生活中,也已成为他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与此同时,当代农村民众的文化生活却是相对贫乏的,闲暇时间人们主要的消遣活动是看电视、打麻将、打牌,缺少可以陶冶人们心灵的文化活动。作为当地家喻户晓的民间小戏,祁太秧歌应当成为丰富当地农民精神生活的重要力量,充分发挥其对民众的教育作用。从剧本角度出发,祁太秧歌应当注意从现实生活中提取素材,编写新剧本。今天,“媳妇权威”^②崛起,使婚后分家、老人赡养等已成为当地农村比较严重的家庭矛盾,祁太秧歌如能在继承小戏传统经典剧目的基础上,挖掘这些反映现实矛盾的新题材,引导民众如何处理类似矛盾,达到调整个体精神世界、协调人际关系、家庭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相信其一定会赢得众多年轻人的喜爱,从而进入一个新的表演繁荣期。

[注释]

①讲述人:苗根深,男,83岁,秧歌老艺人,青衣;讲述地点:

祁县苗家堡村;搜集时间:2004年8月6日。

- ②黄涛在其著作《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中针对华北农村婚姻家庭生活提出来的,即老辈的权威向小辈转移,小辈的权威向媳妇转移,父系长辈权威失落。

[参考文献]

- [1] 董晓萍. 田野民俗志[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2] 王跃生. 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3] 董晓萍. 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民众[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4] 毕苑. 秧歌里的世界——兼论民俗文献与中国社会史研究[J]. 民俗研究, 2001(3): 77—100.
- [5] 张云霞. 婆媳冲突: 内隐的男权世界——从祁太秧歌“婆媳冲突”型剧目中看近代家庭的男性权威和长者意识[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8): 56—63.
- [6] 雷焕贵. 祁太秧歌中映射出的伦理观念[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04(12): 118—120.
- [7] 麦高温.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8.
- [8] 董晓萍. 说话的文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The Analysis of Female Life History in the Yangge Dance in Qi and Taigu County

QIAN Yong—ping¹, QIAN Yong—qin²

(1. School of Literature & Mass Communication Mianyang Teacher's College, Mianyang 621000, China;

2. Jiaokou Middle School Shanxi, Jiaokou 032400, China)

Abstract: The Yangge Dance in Qi and Taigu County is loved to see and hear by local people of Jinzhong area. There are many play books about family conflict, combined with the life history of local society, these play books imply that the female of the lower society fight against the authority of husbands and patriarchs pursue the blessedness of marriage. Furthermore, the Yangge in Qi and Taigu County conveys the female dignity of discourse right and the humanist attention of individual value of life.

Keywords: the Yangge in Qi and Taigu County; family conflict; female view the values of the female

(责任编辑 杨乐中)